

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

王 诺

内容提要 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生态批评的对象不仅仅是生态文学，也不仅仅是直接描写自然景观的作品；生态批评从生态主义思想和生态审美的角度重审和重评古往今来所有文学，特别是对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经典作品。其任务是要丰富文学的生态含义、揭示文学的生态局限，从而推动人们建立生态的文学观念和生态的审美观念，促使人们形成并强化生态意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词，从字面上看，似乎是将生态学与文学批评结合起来的批评。的确，早期的生态批评倡导者最是从生态学那里获得启发的。密克尔对“文学生态学”的解释就基本上局限于文学与生态学、生物学的关系方面：“文学生态学是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学主题和关系的研究。同时它又是发现人类物种在生态学中所扮演之角色的一种努力。”^①鲁克尔特说得更为明确。他认为生态批评就是要“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为文学研究提供生态学和生态学概念”，“为文学的阅读、教学和写作提供生态学概念进而发展出一门生态诗学”。他还给出了一个理由：“因为，比起近些年来我所研究的任何学问来，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作为人类目光的基础）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具有最为重大的意义。”^②

然而，随着生态批评走向深入、走向更广阔的领域，大多数生态批评家都摒弃了密克尔和鲁克爾特的观点，虽然保留了“生态批评”这个术语。格罗特费尔蒂批评道，“鲁克爾特的定义特别关注生态科学，这太狭隘了”^③。克洛伯说得更清楚：“生态批评并非将生态学、生物化学、数学研究方法或任何其它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用于文学分析。它只是将生态哲学最基本的观念引入文学批评。”^④尽管有些生态批评家也引用了一些生态学研究成果、环境科学研究数据，但从整体来看，生态批评里的自然科学成分并不突出。生态批评不是生态学这门自然科学与文学批评的简单相加，不是套用自然科学术语的批评。生态批评主要吸取的并非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它吸取的是生态学的基本思想——主要是整体观、联系观、和谐观等。生态批评最主要的思想资源不是来自生态学，而是来自生

态哲学。生态批评是在生态哲学思想指导下的文学批评。

生态批评的“生态”首先是指一种思想观念——生态主义的思想观念，其核心是生态整体主义；其次是指一种美学原则——生态的审美原则。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生态批评的美学原则主要有自然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和交融性原则。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生态批评的界定、对象、任务及其贡献与限度进行探讨。

在众多的对“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界定当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五种：

詹姆斯·汉斯在1990年给出的定义是：“生态批评意味着从社会和地球的语境中考察文学（和其他艺术）。文学不是存在于它自己的与外界隔绝的领域里，因此将我们对文学的讨论限制在文学性本身，就阻断了文学与其他系统的至关重要的联系，而正是那些联系把我们的价值观念的表达结合起来。”^⑤这个定义凸显了生态批评与新批评等只关注文本和形式的现代主义批评的差异，明确了生态批评的考察视域并不局限于社会领域和人与人的关系，而是延伸到整个地球生态与文学的关系，强调了生态批评的价值观念表达和阐述。此外，这个定义没有将生态与社会割裂开来，说明汉斯认识到了社会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决定性作用。

但是，这个定义有两个方面的重大缺陷。其一是，它未能明确生态批评的文学考察依据什么思想和标准，未能指出生态批评所要表达的价值观念是什么——是生态主义的价值观念还是环境主义的价值观念。其二是，它没有涉及生

态批评独特的美学观念和美学标准。如果不能指出生态批评独特的哲学思想基础和独特的美学原则、美学标准,就不能揭示出生态批评的本质特征,不能揭示生态批评与传统批评的根本差异。汉斯在生态批评价值观念方面的含糊,也许是有意为之的。他的基本倾向是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观,但似乎对这种价值观念的论证缺乏自信,或许并不想与生态主义划清界限。从学术策略的角度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定义的学理性和逻辑性来看,这样做是有缺陷的。

1994年,在有关生态批评的盐湖城圆桌会议上,学者们集中讨论了生态批评的术语界定问题。那次密集性的术语界定影响很大。在提交会议的近二十种界定中,最重要、也最有影响的是斯洛维克的界定:“生态批评意指两个方面的研究:既可以用任何一种学术的方法研究自然书写;也可以细致研究任何文学文本的生态含义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使那些文本初看起来似乎显然描写的是非人类的世界。这种新的研究热点……反映出当代社会对非人类世界的重要性和脆弱性的不断增长的意识。”^⑥斯洛维克的这个定义涵盖面宽,似乎想把所有现存的文学批评方法都囊括进来,声称用什么方法都可以研究自然书写。它特别关注自然书写(Nature Writing)和非人类世界的描写;因为生态批评,至少是美国的生态批评首先是从自然书写评论那里延伸出来的,前期生态批评的主要对象也的确是当代的自然书写、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以及描写自然及其与人关系的北美印第安人文学。这一定义最大的优点和最具有指导意义的地方在于:在生态批评家还很少关注传统文学的生态视角解读和重评的90年代中期,这个定义引导生态批评家开拓更广阔的批评领域。事实上,在斯洛维克等人的不断倡导下,90年代中期以来的生态批评在生态视角的经典文本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是,这一定义也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它将生态文学与自然书写混为一谈,尽管这种混淆也有一定的事实依据。“自然书写”这个术语对写作对象的限制过于狭窄。生态文学并不仅仅是单纯地描写自然的文学,它侧重于发掘人与自然的紧张、疏离、对立、冲突关系的深层根源,即造成人类征服和掠夺自然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等社会根源,因此有的作品甚至可以完全不书写自然,但却因其深刻地发掘了导致人类破坏自然的社会原因而堪称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自然书写”这个术语在思想上和体裁上涵盖面太宽。无论作者对自然持什么观点和态度,只要写的是自然,其作品都可以算作自然书写,甚至包括非生态甚至反生态的作品。例如,《诺顿自然书写文选》所选的一些作品就不具备生态意识。使用“自然书写”无法将生态文学不同于一般的描写自然的文学区分开来,无法将生态文学最突出的特点和主要使命显示出来。另外,“自然书写”还把非文学的写作也包括进来,不少自然书写文选都收入了相当数量的哲学、自然史、政治学、宗教学、文化批评等著述,从而大大超出了文学

研究的范围。正因为如此,有人质疑:“自然书写”是文学吗?对“自然书写”的研究是文学研究吗?所以,著名生态批评家默菲坚持用“自然文学”或“自然取向的文学”取代“自然书写”,并仔细地分析了两者的差异^⑦。由此可见,“自然书写”这个术语既不能把生态文学全部涵盖,又将许多非生态的文学创作和非文学写作与生态文学混为一谈。

其次,虽然这个定义也涉及关于非人类世界的意识,但到底是什么样的意识,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意识,还是生态主义的生态意识?斯洛维克并没有明确指出。在这一问题上,坚持弱人类中心主义的欧美生态批评家处于两难境遇。一方面他们不愿意放弃环境主义;另一方面他们谈的又是“生态”的批评,他们不能否认“生态”与“环境”这两个词的明显差异(两个词背后的理论支撑一个是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另一个则是环境主义),他们没法否认“环境”一词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论蕴涵。于是,他们要么采取模棱两可的表述,要么声称他们所说的“环境”与这个词的本意不同。然而,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界定,怎么能模棱两可,怎么能抛弃人类长期以来约定俗成、普遍认可的含义而使用一个词?

第三,这个定义将批评的对象局限在描写非人类世界的文本上,无论是当代的自然书写文本还是传统的描写自然的文学文本。这说明定义者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揭示生态危机的社会、文化和思想根源之重要性,没有充分认识到生态批评不仅仅要探讨描写自然的作品,不仅仅要张扬生态意识,还要批判反生态的思想、文化、发展政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要推动人类的思想文化的变革——朝着有利于生态整体的持续存在的方向变革。

最后,这个定义也没有揭示生态批评在审美角度的批评方面有什么特征,没有在美学和文艺学意义上给生态批评下一个判断,尽管它并没有排除美学和艺术角度的批评,它声称可以用任何方法从任何角度来研究。

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的定义被多数生态批评家认可或引用,它非常简洁:“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格罗特费尔蒂进一步解释道:“所有生态批评仍然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人类文化与物质世界相互关联,文化影响物质世界,同时也受到物质世界的影响。生态批评以自然与文化、特别是自然与语言文学作品的相互联系作为它的主题。作为一种批评立场,它一只脚立于文学,另一只脚立于大地;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它协调着人类与非人类。”^⑧格罗特费尔蒂把生态批评定义为研究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批评,特别提到文化与自然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揭示了这种批评最重要的使命: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挖掘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这一点恰恰是生态主义的主要诉求。这是这个简洁的界定最突出的长处。这个界定还有一点特别值得重视,那就是它明确提出:生态批评应当一只脚立于文学——立足于文学文本、立足于审美和艺术等文学内在的特性;另

一只脚立于大地——立足于整个生态系统，要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大地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代名词，格罗特费尔蒂随后又说“生态批评将地球中心的思想引入文学研究”^⑨，表明她坚持生态整体——地球的利益是最主要的和终极的价值判断依据。由此可见，她的主要倾向是生态整体主义的。两个“立足”说给我们很大的启示，那就是，对于生态批评的界定一定要包含两个方面：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方面和生态审美方面。此外，这个定义指出，作为理论话语的生态批评的目的，是要协调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其潜在含义是，生态批评的思想支撑既可以是努力改善环境质量、促使人与环境和谐的环境主义，也可以是努力创建生态文明、并以此重建生态系统平衡的生态主义。由此看来，这是一个在思想上包容性很强的定义，也正因为这样，它获得了多数人的认可。如果仅仅从术语的涵盖面来考虑，仅仅考虑术语将生态取向的批评和环境取向的批评都包括进来，那么，自然应当赞同这个定义。

然而，如果我们还要考虑术语界定的学理价值，还要考虑它的逻辑严密性，就不能不指出这个界定是有着内在矛盾的。它既试图把环境批评包容进来，把所有探讨文学与环境之关系的研究包容进来，为此不惜使用“环境”一词而不使用“生态”一词，不惜留下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论的痕迹；又不想放弃她的地球中心——整体至上的价值观，虽然她明明知道也明确指出了“环境”一词所包含的人类中心主义理念。看得出，格罗特费尔蒂是煞费苦心的。但这种煞费苦心的周全考虑是付出了代价的，代价就是术语在思想层面的矛盾性、不鲜明性：回避了“生态”的含义，没有明确生态批评的思想特征。此外，这个定义也没有明确给出“立足于文学”的具体含义，没有界定生态批评在审美方面的特征是什么。

威廉·豪沃斯则从词源学的角度来定义，他把生态批评定义为“家事裁决”：“Eco（生态的）和Critic（批评家）都来自希腊文，分别出自oikos和kritis，两个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家事裁决’（house judge），这个意思可能会让许多绿色书写和户外书写之爱好者吃惊。对‘生态批评家’这个词也许可以给出一个更长且曲折的解释：‘某个主张赞美自然、谴责自然的掠夺者并通过政治行动减少对自然伤害的人，判断那些描写文化对自然之影响结果的作品好坏优劣，这样的人就是生态批评家。’因此，这个oikos指的就是自然，是被爱德华·霍格兰称为‘我们最宽广的家’的地方，而kritos则是一个有品位的裁决者，他希望这个家有良好的秩序，靴子和盘子没有乱扔一气，没有破坏原本的布置。”^⑩豪沃斯的这个界定突出了生态批评的主要使命和目的，更重要的是它强调整体性原则，把包含人类在内的自然当作一个整体，一个家，强调了这个整体内部的秩序，强调了遵守自然原有的规定和规律。由此可见，豪沃斯的基本思想取向是生态整体主义的。这个界定还给了生态批评家很高的地位——明确说生态批评家就是描写

自然与文化之关系的作品的评判者。

但是，这个以形象的语言做出的术语界定太不学术化，也很不清晰，不太严谨，界定的本身还要界定和解释。否则，很难知道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家”，是地球之家、生态之家还是家庭之家，很难知道裁决的标准是什么，是生态整体、生态秩序、自然规律，还是人类家庭的家法家规。由于不明晰，连界定者也承认，很可能让人有“家庭内”和“室内”的联想，有人类中心主义的联想，令热爱描写自然与人之关系的作品的人吃惊。此外，这个定义也忽视了生态批评在审美方面的特征。

劳伦斯·布伊尔给生态批评下的定义也相当简洁：“在献身环境运动实践的精神指引下的对文学与环境关系的研究。”^⑪确切地说，布伊尔是在给环境批评下定义，而不是给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批评下定义。然而，布伊尔虽然始终坚持环境批评的提法，但却一直在说服人们——特别是要说服坚持生态批评的学者放弃“生态”改称“环境”，他也始终在努力把所有生态批评研究包容在他所谓的环境批评研究里。因此，本论文在讨论生态批评的界定时，既明确坚持生态主义的立场，也包容性地将以布伊尔为代表的环境批评界定看作对生态批评的一种界定。

布伊尔这个定义最突出的优点是强调了生态批评的使命，强调了生态批评家不能仅仅关注学理，还必须关注生态危机现实，关心环境运动。生态批评是一种对介入性很强的批评。它要介入人类的环境保护运动、人类的生活方式和 社会发展政策，当然这种介入是从思想文化上介入。处于当今危险的世界里，生态批评必须向人类、向社会发出声音；当然这声音是通过文学批评而发出的声音。

布伊尔的基本思想倾向是环境主义的，是弱人类中心主义的，他不仅重复了格罗特费尔蒂的“文学与环境关系的研究”，而且还更加突出了环境主义，把环境运动的思想作为指导精神。因此，从学理上说，这个定义是不能将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批评包容进来的。不过，布伊尔的定义本身在学理上没有问题，他本来就是为环境批评下定义。他只不过也像生态主义的批评家试图包容环境批评一样，善意地想包容所有的生态批评。此外，这个定义也没有指出生态批评或者环境批评在审美层面上的特征，虽然他在其著作里对梭罗的审美观与以爱默生为代表的传统审美观的差异、污染和毒化的审丑、场所的审美等生态审美有过很多富于启发性的论述。

值得尊敬的是，布伊尔并没有因为其善意、策略和宽容而损伤他学术研究的严密性和科学性，他始终严格地、内在精神一致地论述他对环境批评的主张，既不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使用“生态批评”这个术语而改变自己的观点，也不因为他善意地希望团结多数生态批评家而放弃自己的坚持。从他的论述中可以感受到一个学者对真理的执著和对学理的坚守。虽然本论文并不认同布伊尔的环境主义思想，但却对他的这份执著和坚守怀有深深的敬意。当布伊

尔在高级别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完主旨报告后，全体与会者起立鼓掌致意。那种敬意主要不是针对其权威地位的，而是对这个学者执著于真理、坚守于学理表达敬意。

可以看出，生态批评这个术语还需要一个新的界定。这个新界定至少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必须旗帜鲜明，不能回避“生态”的含义，要明确指出生态批评的逻辑起点和核心价值是什么。这方面布伊尔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他明确提出环境批评就是在环境运动精神指导下的批评，生态批评家也应当明确提出自己的指导思想。二是必须坚持学术的严谨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以开放的、支持多元共生的态度对待这个领域所有不同倾向的研究，但在学术观点上不能含糊、不能自相矛盾。三是必须弥补欧美学者在生态审美原则方面的缺陷，即使一时不能完全弥补，也要努力做出尝试。

根据以上对生态批评思想特征和美学原则的论述，并吸取以上主要的国外定义之利弊优缺的经验教训，努力实现术语界定的上述三个要求，本论文给生态批评下的定义是——

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

这个定义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生态批评思想特征的确定，明确提出生态批评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其次是对目的任务的确定，指出生态批评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是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和生态的艺术表现；第三是研究范围的限定，限定在文学与自然的关系范围内，生态批评不能脱离自然去研究文学文本中单纯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内心世界；第四是批评对象的限定，生态批评对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的探讨、对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的探讨，都是通过文学研究而进行的，是以文学作为媒介展开的。

当然，必须认识到，生态思想的普及和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时间的、艰难的过程。生态主义还包含了多元共生的思想。因此，生态主义对所有主张保护生态，反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研究和行动都持欢迎的态度，无论其思想基础是环境主义的、弱人类中心主义的还是二元论的。生态批评充分肯定环境批评对环境保护、对普及环境意识、对环境文学和环境美学发展的重要贡献，尊重其思想，甚至在一个较长的阶段内将环境批评视为生态批评的一部分，至少是与生态批评密切相关的部分，在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主张的同时，与环境批评共生共荣，共同发展。思想的坚持、学术的争论并不影响生态主义的生态批评与其他思想倾向的环境批评的交流合作，相反还会促进这种交流与合作。正因为如此，以贝特、豪沃斯、德里斯、史密斯、格罗特费尔蒂等为主要代表的倾向于生态主义的生态批评家，与以布伊尔、斯洛维克汉斯等为主要

代表的倾向于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批评家，始终保持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良好发展的关系。

本论文给出的生态批评定义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指向性含义：它研究和评论的对象是整个文学，绝不仅仅是生态文学，绝不仅仅是直接描写自然景观的作品，更不仅仅是“自然书写”。是否描写了自然，不是生态批评能否展开的必要条件。只要有关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只要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影响，文学作品哪怕完全不涉及自然景观，哪怕只表现一个破坏生态的政策出台过程、一种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一次严重的污染事件（比如生态审判所审的就不一定是自然物，而更多的是人造物或人类行为），也是生态批评应当探讨，甚至重点探讨的对象。布伊尔指出，“没有一个事物不能以这种方式（指生态批评的方式）惊人地和创造性地再想象”^⑩，他还以其生态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他的著作包含了广泛的生态性解读，其中不少是对文学作品的城市描写和社会丑陋事物描写（当然是与生态有关的社会丑陋事物）的生态视角的解读。生态批评家洛夫也认为，“值得关注的文学作品当然并不一定非要具备环境正确性或环境公正性，甚至不必具有任何明显的环境内容；但是，有价值的解读之可能性经常呈现于那些学生和批评家面前，他们选择了与文本的明显旨趣和原本旨趣格格不入的阅读方式，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关注转向了生物中心主义的批评关注”。“从生态的角度而不是狭隘的人类中心的视角去阅读，为人们在这些方面重新思考经典作品提供了许多可能性。”^⑪从根本上说，古往今来绝大多数文学作品都包含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思想文化因素，对它们进行生态批评完全具有合理性。

正因为如此，生态批评对文本的解读和评论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代文学，传统文学，特别是对人类文明和社会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经典作品，也是生态批评的重要对象。斯洛维克在1999年的《现代语言学会会刊》的“生态批评论坛”上强调，生态批评的范围不仅包括研究那些明确表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而且还包括研究所有类型的任何作品——努力发掘其中的生态意义。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从绿色的视角来审视，“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不管它产生于何处，完全不能被生态地解读”^⑫。他主编的《生态批评》的第一部分，标题就是“价值重估”，在书的封底他又给出了解释：“‘价值重估’部分提供的是对熟悉的环境作家的新的阅读，以及对通常不从绿色视角审视的作家和文学传统的环境视角的重新审视。”^⑬彼得·巴里在他的《起点理论：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导论》里将生态批评的对象和任务归纳为五大类，第一个就是文学经典重读和重审：“生态批评家要做什么？他们要从生态中心的视角重读主要的文学作品，特别关注对自然界的表现。”^⑭

重审和重评传统文学的直接目的，是要揭示经典作品以往被人们忽视、然而又确实存在的生态思想和生态审美，

要对反生态的文学作品进行生态角度的批判；重审和重评的间接目的，是要推动学界对文学发展史做出整体性的重新评价和重新建构，推动人们建立起生态的文学观念和生态的审美观念；重审和重评的最终目的，是要寻找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是要促使人们形成并强化生态意识（包括生态审美意识），推动人类的文化变革，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正如斯洛维克所言，“和女性主义批评与非洲裔美国人文学批评呼吁文化改变一样，……生态批评也提倡文化变革，它要考察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界的种种狭隘假设如何限制了我们想象一个生态的、可持续的人类社会的能力。……在文化的重审和重构进程中，生态文学的研究和分析将发出响亮的声音”^⑩。

事实上，从生态批评的开端之作——密克尔的《幸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开始，生态批评就没有把自己局限在自然书写和生态文学范围内。密克尔评论了《神曲》和《哈姆雷特》，贝特和克洛伯评论了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布兰奇和斯洛维克共同主编的《ISLE 读本：生态批评1993—2003》所收入的论文既有对利奥波德、斯奈德这样的一般认为是生态作家的研究，也有对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样的很少有人从生态角度认识的作家的生态解读。

传统文学的蕴涵丰富而复杂，其中往往既有非生态、反生态的思想，又有生态的思想和生态的审美及其表现。斯洛维克说得对：“生态视角的重新解读和评价，目的是丰富传统文学的生态含义或揭示传统文学的生态局限，但绝对不是以一个新的亮点掩盖原来的亮点。比如说，《圣经》的思想就是很复杂的，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征服控制自然观，也有善待自然保护自然的思想。神学界对此有深入全面的讨论。又如，培根的作品中的确有很多反生态的思想，但也有一些生态的意识。莎士比亚的情况也同样复杂。”^⑪生态视角的重审和重评应当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传统文学经典，避免简单化和以偏概全的倾向。

生态批评并不拒绝历史地、发展地看待传统文学的非生态和反生态的内容。它充分理解那些作品产生的原因和产生的语境。人类在20世纪后半叶之前虽然一直在对自然进行开发、控制和改造，但总体上看，并没有突破自然承载力能够承受的范围，还没有造成生态系统的全面恶化，还没有出现生态危机和生命供给系统全面崩溃的征兆。因此，生态批评并不是要以当代的生态思想苛求过去的作家和作品，也不是要脱离作品产生的语境而评价它们。

但是，必须明确指出的是，生态批评的“历史地看文学”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不脱离当时的语境客观地讨论作品的生态性和反生态性，深入理解文本的生态思想和非生态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二是要分析和评价该作品在人类反生态的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反思人类的文明进程究竟在哪些地方出了错，判断特定的作家作品在那些错误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只有这样，生态批评才能真正完成它的使命——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

源，促使人们形成并强化生态意识，推动人类的文化变革和生态文明建设。

欧美生态批评为文学批评、美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开拓了新领域、提供了新课题、输入了新的发展动力。从文学研究的知识谱系来看，生态批评开拓新领域的意义十分重大。文学研究发展到今天，人们逐渐认识到它的较为完备的知识系统应该包括纵横两大体系。我们可以从纵横两个维度来这样概括（括号外的为纵向，括号内的是横向）：这一知识系统包含作家研究（包括作家的思想、人格、心态、审美经验、艺术特质、创作过程与作品的关系、与社会^⑫的关系、与自然的关系）、作品文本研究（包括文本内部研究、文本与社会的关系、文本与自然的关系）、作品接受研究（包括接受者的思想、人格、心态、审美经验、艺术特质、接受过程与作品文本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自然的关系）。无论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还是探索文学发展规律的文学史研究、探索审美规律的美学研究以及探索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研究，都离不开对这个纵横交叉的知识系统的研究。从这个知识系统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哪一个纵向环节，文学研究都离不开对文学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而且，从理论上说，无论在哪一个纵向环节，对文学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数量上都至少应该占到整个文学研究的三分之一的份额，更何况社会与自然本身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即使是研究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的关系，也一定会涉及自然。然而，十分明显地，文学研究发展了数千年，但在文学与自然关系研究方面严重不足，从而导致整个文学研究知识系统的畸形与失衡。生态批评的崛起，推动了文学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弥补了以往文学研究在这个方面的严重缺失，有助于文学研究的发展更为系统、更加平衡。

20世纪以来，欧美的文学研究出现了“向内心转”和“向文本形式转”的倾向，也出现了消解意义和价值的倾向。这些倾向本身虽然有其合理性甚至必然性，但同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偏颇。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倡导文学研究向自然转向、向地球转向、向生态意义和生态审美转向的生态批评产生了，这不仅有助于弥补文学研究数千年来来的不足，也有助于纠正当代文学研究的某些偏颇。应当说，当代文学研究事实上已经在文学和文学研究自身规律的作用下校正其发展了。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文化批评、后殖民批评等的出现就是证明。生态批评把这种超越文本形式的“向外转”、“向意义转”、“向文化转”、“向社会转”的态势进一步加强，将探索的领域进一步拓宽，同时它还扭转了文学研究日趋学院化、晦涩化和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生态批评是介入性很强的批评，它不仅要从从事纯学理的文学研究，而且还肩负着社会思想文化批判、生态意识的普及、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任。

生态批评最大的贡献是给文学研究带来了整体上说是全新的理念——生态哲学的理念、生态美学和文艺学理念，

并赋予文学批评它应当担当的自然使命和社会使命。它毫不掩饰地声称要挖掘和批判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明确地倡导批评家为缓解直至消除生态危机承担责任。从文学的社会和自然功用的角度来看,如果说生态危机是当代人类面临的主要危机之一,那么生态批评就应当是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如果认可生态危机是当代乃至未来人类最大的危机,那么生态批评就是当代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研究最重要的、最紧迫的任务。当代最有影响的批评家之一布伊尔在2005年指出,现在西方文学研究界的情况是:多数批评家都产生了“我怎样才能跟上(生态批评或环境批评)这个新工作的步伐”^①的紧迫感。这种发展态势值得所有文学研究者高度重视。

在重视和倡导生态批评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生态批评的限度。生态批评不是无边的,不是万能的,不是可以包办所有文学研究的。生态批评仅仅是文学批评的一个分支,一个维度,尽管是几千年来被严重忽视的维度。

文学从总体上还是人学,是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及其理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积淀,主要关注人、关注人类社会,主要从人的价值和人的利益之角度考虑问题,这是有充分理由和必然性的,虽然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虽然离开了自然不可能全面完整地认识人和社会。数千年来文学所创造的思想价值、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极其巨大、极其重要的,值得深入研究和高度评价,即使那些价值与生态无关甚至是反生态的。

生态批评在拓开文学研究新领域的同时,并不否认也不可能否认文学研究其他领域、其他流派、其他方法的重要性,并不想也不能取代其他的文学批评。生态批评倡导的是生态整体内部的多元共生,绝对不是一元独大,也不是二元对立。因此要充分尊重和理解非生态主义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并把自己的领域严格限定在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范围内。生态批评只是希望向越来越多的人——文学领域和非文学领域的人——证明:生态问题在当今极其重要,重要到关乎人类和整个地球的生死存亡,文学家和批评家可以也应当在这个问题上发出声音,可以也应当为缓解直至消除生态危机做出贡献。

(本论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批评的困惑与解惑”的中期成果)

- ① Joseph W. Meeker, *The Comedy of Survival: Literary Ecology and A Play Ethic*, Third Edition,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7, p. 7.
- ②③⑧⑨ 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ed.),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p. 115, 107, p.xx, pp. xviii, xix, p. xviii.
- ④ Karl Kroeber, *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 Romantic*

Imagining and the Biology of Mi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5

- ⑤ James S. Hans, *The Value(s) of Literature*, Albany: SUNY Press, 1990, p. 5.
- ⑥ Scott Slovic, “Ecocriticism: Storytelling, Values, Communication, Contact,” 1994 Western Literature Association Conference, Salt Lake City, Utah.
- ⑦ Patrick D. Murphy, *Farther A field in the Study of 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0, p. 11.
- ⑩ William Howarth, “Some Principles of Ecocriticism”, 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ed.),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 69.
- ⑪ Lawrence Buell,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30.
- ⑫ Laurence Buell, *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Literatur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U.S. and Beyond*,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2—23.
- ⑬ Glen A. Love, *Practic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Bi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3, pp. 34, 35.
- ⑭⑮ Branch, Slovic(ed.), *The ISLE Reader: Ecocriticism, 1993—2003*,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3, p. xix, the back cover.
- ⑯ Peter Barry, *Beginning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Second Edi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64.
- ⑰ Branch, Johnson, Patterson and Slovic(ed.), *Reading the Earth;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Moscow, Idaho: University of Idaho Press, 1998, p. xiii.
- ⑱王诺、斯洛维克、王俊璋,《我们绝对不可等待》,《读书》2006年第11期。
- ⑲这里所说的“社会”包含社会意识形态,即是指它不仅是指社会有形的、物质的方面,还指其无形的、精神的、非物质的方面。
- ⑳ Lawrence Buell,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p. vii, 1.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吴子林